

《历史研究》 五十年论文选

(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下)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历史研究》 五十年论文选

（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下）

（历史研究所 编 陈旭麓 编）



第 一 卷

历史研究所编 陈旭麓编

《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

(20 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下)

《历史研究》编辑部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20 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上、中、下）

编 者 / 《历史研究》编辑部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责任部门 / 编辑中心 (010) 65232637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张晓莉

责任校对 / 段 青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51.75

字 数 / 912 千字

版 次 /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190-540-7/K·129

定 价 / 129.00 元（上、中、下）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	林甘泉 / 1
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	戴 逸 / 33
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	林被甸 董正华 / 50
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	于 沛 / 84
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白 钢 / 108
二十世纪的中国科举制度史研究	何忠礼 / 131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	周积明 / 165
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	李根蟠 / 198
中国古代人口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袁祖亮 延 胜 / 248
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陈明光 郑学檬 / 273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赵世瑜 邓庆平 / 316
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	常建华 / 357
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	任 放 / 405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	葛剑雄 华林甫 / 441
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荣新江 / 491

2 《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 (20 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下)

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马大正 / 523
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陈高华 / 554
中国交通史研究一百年	王子今 / 577
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朱凤瀚 / 617
二十世纪简帛的发现与研究	谢桂华 沈颂金 郭文玲 / 668
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郝春文 / 737
中国二十世纪文献辨伪学述略	刘重来 / 790
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	沈长云 / 813
二十世纪的中国秦汉史研究	周天游 孙福喜 / 848
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曹文柱 李传军 / 908
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张国刚 / 971
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王曾瑜 / 1028
二十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	宋德金 / 1053
二十世纪的中国明史研究	南炳文 / 1101
二十世纪的清史研究	钞晓鸿 郑振满 / 1152
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朱 英 / 1241
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	冯筱才 / 1292
二十世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	夏春涛 / 1339
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	姜 铎 / 1390
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	戚其章 / 1413
二十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	严昌洪 马 敏 / 1459
美国史研究百年回顾	张友伦 / 1501

中国的英国史研究	钱乘旦 / 1527
中国的法国史研究	陈崇武 / 1549
二十世纪的中俄关系史研究	黄定天 / 1576
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回顾	王晓德 雷泳仁 / 1600
编后记	/ 1625

二十世纪的中国明史研究

南炳文

百年来的明史研究状况，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和一个非常时期。第一个阶段为 1901～1949 年新中国成立；第二个阶段为 1949～1966 年“文革”运动爆发；第三个阶段为 1976 年粉碎“四人帮”至 20 世纪末。一个非常时期为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之间的“文革”十年时期。这三个阶段和一个非常时期的明史研究，各有不同的处境和特色。

一 明史研究的新阶段

1901～1949 年，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一方面民族危机非常严重，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顽强地进行着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此时，国内外交往也空前频繁，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想，包括进化论和实用主义史学新观点、章节体和传记文学体史学编撰新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等，纷纷传入中国，使中国史学界突破了封建史学的束缚，研究领域、观点、方法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样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背景下，明史研究与 20 世纪以前的传统史学相比面貌大改，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主要表现是：为帝王撰写家谱式的狭窄研究，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广阔领

域、多种角度的研究所替代；在研究的观点方法上大多不再是鼓吹三纲五常，颂古非今，或简单地罗列历史现象，而是应用新观点（如进化论、唯物史观）、新方法（如章节体、传记文学体、现代自然科学的见解），使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为适应现实斗争或生活的需要，注重与之相关内容的研究，如明末与南明史、明代东北地区及满族先世史、以抗倭为主的中日关系史、郑和下西洋、中欧关系史等，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也是其时明史研究令人注目的一个现象。

关于明末与南明的历史，早在清朝前期，已有明朝遗民着力进行过研究，既用于寄托其故国之思，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又用以鼓吹民族思想，与清朝相对抗。进入 20 世纪之后，随着各阶层人民反清情绪的增长，这类研究更趋高涨。到了三四十年代，在抗日热潮兴起的历史条件下，它又被利用来作为鼓舞士气、救亡图存的重要舆论工具，从而更加兴盛。史家或整理出版有关史料，或研究明末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状况，或表彰明末至南明坚持抗清的志士及暂不与清朝合作的明朝遗民，或记载南明诸王的活动，或综述南明各方面的事迹，取得了累累硕果。所出版的专书、论文等有：陈去病辑《陆沉丛书》（1903 年石印本）、国学保存会辑《国粹丛书》（1905～1909 年间排印）、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商务印书馆，1934 年）、朱倬《明季社党研究》（商务印书馆，1945 年）、李文治《晚明民变》（中华书局，1948 年）、梁启超《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新民丛报》第 46～48、49、50 号，1904 年 2、6、7 月）、吴汝柏《民族英雄袁崇焕》（广西省政府编译委员会，1940 年）、杨德恩《史可法年谱》（商务印书馆，1933 年）、易君左《史可法》（上海新生命书局，1933 年）、黄节《张煌言传》（《国粹学报·史篇》1 卷 5 期，1905 年）、冯励青《张煌言年谱》（独立出版社，1942 年）、匪石《郑成功传》（日本东京清国留学生会，1904 年排印本）、余宗信《明延平王台湾海国记》（商务印书馆，1937 年）、

民史氏(孙静庵)辑《明遗民录》(上海新中华图书馆,1912年)、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辅仁大学,1940年)、包遵彭《明监国鲁王圻志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0年)、朱希祖《南明广州殉国诸王考》(《文史杂志》2卷7、8期,1942年)、柳亚子《南明史纲初稿》(《大风半月刊》,1941年)等。这一时期关于明末与南明历史的研究,除去鼓吹民族革命思想这一相当普遍的特色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色应予注意,即在三四十年代,国民党的一些御用文人,为“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寻找历史依据,曾对这一段历史大加歪曲,用明末农民起义军影射共产党人,如李奇流《中国明代匪乱的总检阅》(《汗血月刊》2卷3期,1933年)一文,即是如此。面对这种局面,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奋起反击,用唯物史观科学地分析明朝和南明各政权的阶级实质、历史地位,揭露其腐朽无能,歌颂明末农民起义军,并对其经验教训给予总结,从而将这一段历史的研究推向了科学的道路。其代表作有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新华日报》1944年3月19~22日)及翦伯赞《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中华论坛》1卷10、11期,1945年)等。

东北地区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建立清朝的满族先世是臣属于明朝的边疆少数民族的成员,因而研究明史不能不谈当时东北地区的情况以及生活在东北的满族先世。而20世纪上半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为了强占中国东北,竟散布“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清朝统治者在入关后也曾极力掩盖满族先世与明朝关系的真相,以抬高其身份。因此,这一时期的明史研究,就不能不把关于明代东北及满族先世的探讨当成一大任务,从而形成一个热点。出版的论著有傅斯年等《东北史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1933年印行)、张维华《明辽东“卫”“都卫”“都司”建置年代考略》(《禹贡》1卷4期,1934年)、孟森《清朝前纪》(商务印书馆,1930年)和《明元清系通纪》(1934~1937年印行)、徐中舒《明初建州

女真居地迁徙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6 本 2 分册，1936 年）、吴晗《关于东北史上一位怪杰的新史料》（《燕京学报》17 期，1935 年）、郑天挺《满清皇室之氏族与血系》（《人文科学学报》1 卷 3 期，1945 年）、李光涛《记奴儿哈赤之倡乱及萨尔浒之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2 本，1948 年）等，以铁的事实有力证明了明朝对东北地区的管辖，从与明朝的关系等不同角度，研究了满族的先世史。

关于明代的中日关系，也是这一时期明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研究者或着眼于总结明代中日间的政府交涉或总体关系，或着眼于论述倭寇对中国的侵扰及中国军民的奋勇抵抗，或着眼于探讨万历年间的抗倭援朝之役，或着眼于有关资料的评介。出版的专书和论文有吴先培《明代与日本足利幕府关系之研究》（《东方杂志》34 卷 14 期，1937 年）、李晋华《三百年前倭祸考》（上海国民外交委员会，1933 年）、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哈佛燕京学社，1934 年）、吴重翰《明代倭寇犯华史略》（商务印书馆，1939 年）、黎光明《嘉靖御倭江浙主客军考》（哈佛燕京学社，1933 年）、欧阳祖经《谭襄敏公年谱》（南昌印记印刷厂，1936 年）、王崇武《戚继光》（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6 年）、李树桐《明代中日朝鲜战争》（《文史杂志》1 卷 6 期，1941 年）、王婆楞《历代征倭文献考》（重庆正中书局，1940 年）等，它们大多将历史与现实相联系，表现了强烈的为现实服务的意向。此外，梁启超《朱舜水先生年谱》（中华书局，1936 年）、魏宗谟《记明末东渡流亡之二志士》（《论学》4 期，1937 年）等论著，主观上是对明末遗民因不与清朝合作而东渡进行赞扬，但在客观上却反映了其时通过东渡而实现的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实。

郑和下西洋之成为研究热点，主要原因是在民族危机存在的情况下，史家们企图借以鼓舞民气。梁启超开风气之先，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发表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新民丛报》3 卷 21 期，1904 年），而后张星烺、向达等先后撰写有

关文章，到了30年代之后，形成非常兴盛的局面。这一时期发现了《通番事迹记》碑文、《天妃灵应之记》碑、南京静海寺残碑、《郑和家谱》等许多价值很高的文献及实物资料，整理了郑和下西洋活动参加者归国后所写的记述见闻之书，发表了许多有深度的著作和论文。主要有李士厚《郑和家谱考释》（1937年自刊）、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商务印书馆，1935年）和《星槎胜览校注》（商务印书馆，1938年）、管劲丞《永乐二十二年郑和受命未行考》（《大公报·史地周刊》94期，1936年）、朱楔《郑和七次下西洋所历地名考》（《东方杂志》42卷12期，1946年）、吴晗《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清华学报》11卷1期，1936年）、范文涛《郑和航海图考》（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束世澂《郑和南征记》（重庆青年出版社，1941年）、郑鹤声《郑和》（重庆胜利出版社，1945年）和《郑和遗事汇编》（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等。

进入20世纪后，欧洲在世界上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中国与欧洲之关系更加复杂，回顾中国与欧洲的交往史，总结经验教训，成为中国史学界面临的任务之一；加上这时中欧人士之间来往互访比以前增加，存于欧洲的有关历史资料被中国史学家发现者越来越多，为研究中欧交往史提供了便利。因此，明代的中欧关系也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一个热点。一方面研究明朝与欧洲国家间的各种交往，另一方面特别着重研究天主教的传入和耶稣会士来华的问题。关于前者，出版有张维华《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利四传注释》（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等论著。关于后者，出版的成果可分五类：其一为天主教传入研究。包括陈垣《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北平图书馆馆刊》8卷2期，1934年）、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圣教杂志社，1938年）、方豪《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集）》（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青年协会书局，1940年）等论文和专书。其二为来华耶稣会士生平研究。包括国安《利玛

窦东来之前后》（《清华周刊》32卷1期，1929年）等论文。其三为来华耶稣会士著述研究。包括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49年）等论著。其四为以耶稣会士为主的来华欧洲人传入欧洲文化成果研究。包括翁幕《明清之交西学东渐考》（《学灯》，1924年8月）、方豪《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文史杂志》3卷1、2期，1944年）以及张荫麟、李俨、陈垣、向达、郑鹤声等所写的有关论文，这类论文数量极多，而且对耶稣会士在这一方面的贡献，基本上给予肯定的评价。其五为与耶稣会士积极接近的中国人士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研究。包括黄节《徐光启传》（《国粹学报》1卷10期，1906年）、徐宗泽《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周年纪念文汇编》（圣教杂志社，1934年）、陈垣《浙西李之藻传》（载1919年《辩学遗牍》、《大西利先生行迹》、《明浙西李之藻传》合订本）、杨振鐸《杨淇园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1944年）等论著。

这一时期，在以上热点问题之外的明史其他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如下：

政治方面，有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清华学报》13卷1期，1941年）和《贪污史的一章》（《历史的镜子》，生活书店，1946年北平版）、吴廷燮《明督抚年表》（1918年排印本）、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商务印书馆，1948年）和《奉天靖难记注》（商务印书馆，1948年）、丁易《明代宦官之干政》（《新中华》复刊6卷17期，1948年）和《明代的特务机关》（《中华论坛》2卷5、6期，1946年）等。它们论及了政治制度、政治事件和政治形势等，内容相当广泛，其中吴晗、丁易关于特务政治和贪污的论述，有影射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意图和作用，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

法律和监察制度方面，发表有沈家本《明大诰峻令考》（《沈寄簪先生遗书》民国刊本）、于登《明代监察制度概述》（《金陵学报》6卷2期，1936年）等论著。

军事方面，有吴晗《明代之军兵》（《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5卷2期，1937年）、解毓才《明代卫所制度兴衰考》（《说文月刊》2卷9~12期，1940~1941年）等论文。其中吴文联系明代的政治、经济背景，分析其军事制度的变化，揭示社会矛盾，表现了较深的功力和较高的史识。

经济与社会方面，有秦佩珩《明代的农业》（《经济研究季报》1卷3、4期，1941年）、龚化龙《明代采矿事业的发达和流毒》（《食货》1卷11、12期，1935年）、吴云端《明代之盐法》（《中央日报》1947年11月12日）、吴晗《记大明通行宝钞》（《人文科学学报》2卷1期，1943年）、万国鼎《明代丈量考略》（《中农月刊》6卷11期，1945年）和《明代屯田考》（《金陵学报》2卷2期，1932年）、王崇武《明代施行屯田的社会背景》（《华北日报·史学周刊》100、101期，1936年8月27日、9月3日）、吴云端《明代之庄田》（《中央日报》1947年7月23日）、梁方仲《明代“两税”税目》（《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3卷1期，1935年）和《一条鞭法》（《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4卷1期，1936年）、王崇武《明代户口的消长》（《燕京学报》20期，1936年）、梁方仲《明代的户帖》（《人文科学学报》2卷1期，1943年）、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印书馆，1947年）、破船《明代地主考》（《明日之土地》8、9期，1947年）、吴晗《明代之农民》（1935年10月1、15日天津《益世报·史学》12、13期）、胡寄馨《明代奴隶制度》（《新中华》复刊6卷13期，1948年）、傅衣凌《明代徽商考》（《福建省研究院研究汇报》2期，1947年）和《明代江苏洞庭商人考》（福建《社会科学》4卷2期，1948年）及《明代陕西商人考略》（福建《社会科学》4卷4期，1948年）、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非繁《明代的上元节》（《北平晨报·艺圃》1936年2月8日）等论著。论及了农业、手工业、商业金融、土地问题、赋税徭役制度、人口与户籍、家族、阶级阶层、社会

救济以及风俗习惯等内容。其中梁方仲关于赋役制度和傅衣凌关于商人的论述，功力最深，对学术界影响甚大。

边疆与民族方面，发表了张鸿翔《明外族赐姓考录》（《辅仁学志》3卷2期，1932年）和《明外族赐姓续考》（《辅仁学志》4卷2期，1934年）、余贻泽《明代之土司制度》（《禹贡》11期，1936年）、韩儒林《明史乌斯藏大宝法王考》（《真理杂志》1卷3期，1944年）等论文。

对外贸易及与亚洲诸国（日本除外）关系方面，出版有谭春霖《欧人东渐前明代海外关系》（燕京大学，1936年）、翦伯赞《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与中国人在南洋的黄金时代》（《时事类编特刊》63期，1941年）、王崇武《读明史朝鲜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2本，1948年）等论著。

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李俨的《明代算学书志》（《图书馆学季刊》1卷4期，1926年）等论文对数学成就研究做出了贡献。1929年陶湘重印《天工开物》，其上载有丁文江《奉新宋长庚先生传》和《重印天工开物卷跋》，这使宋应星及《天工开物》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丁文江还整理出版了新版《徐霞客游记》（商务印书馆，1928年），开始了以现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徐霞客及其游记的新阶段。1941年浙江大学举办的徐霞客先生逝世300周年纪念会所辑成的论文集《地理学家徐霞客》（商务印书馆，1948年），就收进了反映这一进展的多篇论文。王庸的《明代輿图汇考（总图之部）》（《图书季刊》3卷1、2期，1936年）等论文，在地理图籍研究上多有收获。秦佩珩《明代水利之研究》（燕京《经济学报》2期，1941年）、张广仁《潘季驯治黄河主张之分析与讨论》（《清华周刊》45卷3期，1936年）等论文，研究了水利工程的实践和理论。单士元等《明代建筑大事年表》（京城书局，1937年）、朱偁《北京宫阙图说》（商务印书馆，1938年）和《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李漱芳《明代边墙沿革考略》（《禹贡》5卷1期，

1936年)等论著,探讨了建筑工程的成就。

文学艺术方面,宋佩韦《明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钱基博《明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郭绍虞《明代文学批评的特征》(《新语》5期,1945年)等论著,从宏观角度探讨了文学成就和文学理论。其中郑著提出中国近代文学史始于嘉靖时期,并将明代俗文学的许多内容第一次写进以文学史命名的书中,见识卓越,影响甚大。郑振铎、胡适、俞平伯、萨孟武、吴晗、柳存仁、孙楷第等发表的论著,专论小说成就,有的考证精深,有的在考证的同时,触及了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的真相。卢前的《明清戏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以及赵万里、赵景深等发表的论著,以赞赏的态度论列了戏曲的成绩。此外,梁乙真《元明散曲小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杨静龢《唐寅年谱》(商务印书馆,1947年)以及郑振铎、傅芸子、向达、杨荫浏、傅惜华等发表的论著,研究了民歌、说唱及宝卷文学、散曲、诗作、散文、舞蹈、音乐和美术等领域的成就。

思想方面,有陈安仁《明代学术思想》(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容肇祖《明代思想史》(开明书店,1941年)及梁启超、冯友兰、钱穆、刘节等发表的论著,从宏观角度进行了研究。余重耀《阳明先生传纂》(上海中华书局,1923年)、钱穆《王守仁》(商务印书馆,1930年)、《王阳明年谱》(《力行要览》编辑社编印)、梁启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北平晨报副刊》1926年12月及1927年1、2月)等论著,探讨了王阳明的身世及其提出的“良知”、“知行合一”等概念。不公仇(刘师培)《李卓吾先生学说》(《天义报》2期,1907年)、黄云眉《李卓吾事实辨正》(《金陵学报》2卷1期,1932年)、容肇祖《李卓吾评传》(商务印书馆,1937年)等论著,介绍李贽的生平,反驳以前对之否定的流行观点,赞扬其挑战传统观念的精神。此外,除了对陈献章、罗洪先、吕坤的思想也有探讨外,更重要的是出

版了嵇文甫《左派王学》（开明书店，1934年）和《晚明思想史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侯外庐《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卷（重庆三友书店，1944年）、吴泽《儒教叛徒李卓吾》（华夏书店，1949年）等尝试应用唯物史观探讨明代思想史的论著，或明确指出思想家的阶级属性，或把十六七世纪认定为中国启蒙思想开始的“天崩地解”的时代，使人耳目一新。

图书事业方面，有顾廷龙等《明代版本图录》（开明书店，1944年）、袁同礼《明代私家藏书概略》（《图书馆学季刊》2卷1期，1927年）和《皇史宬记》（《图书馆学季刊》2卷3期，1928年）、汪闾《明清蟫林辑传》（中华图书馆协会，1932年）、郭伯恭《永乐大典考》（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等，分别论列了图书出版、公私藏书、图书整理及目录学方面的成绩。

人物方面，除前文提及者外，影响较大的专著有吴晗关于朱元璋的几本传记（胜利出版社，1944年版《明太祖》、在创出版社1944年版《由僧钵到皇权》、上海三联书店1949年版《朱元璋传》）、陈翊林《张居正评传》（中华书局，1934年）、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开明书店，1945年）等。吴书资料欠丰，但思想内容有一定深度；陈书发挥了清末梁启超等人以来肯定张居正为大政治家的观点，与旧史书的评价大不相同；朱书采用了新的传记文学体裁，准确而生动。

综合性断代史撰写方面，尚未出现专门著作，但出现了柳诒徵《历代史略》（中新书局，1905年）等多部用章节体撰写的中国通史，其中包括对明代部分的综合论述。更引人注目的是出版了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新华出版社，1942年）和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大连光华书店，1948年）等用唯物史观作指导而写出的包括明代部分的中国通史著作。其中吕书较早地明确论及明代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史识非前人可比。

史料史籍的整理介绍方面，罗振玉、陈寅恪、傅斯年等对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整理介绍，被看做民国初史学界的一次史料